

# 日本遣唐使简史

RIBEN QIANTANGSHI JIANSHI

池步洲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日本遣唐使简史

池步洲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封面设计 叶 导

**日本遣唐使简史**

池步洲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 4 字数 70,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 11299·003 定价: 0.36元

## 前 言

中日两国两千多年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莫过于公元七世纪初叶至九世纪末由日本皇廷派出的友好使者——遣唐使。在二百六十多年间任命十九次、成行十六次的遣唐使，规模之大、历史之久、牺牲之巨，为后人所惊叹。他们成果之丰硕，对日本文化提高和国家改造所作贡献之宏伟，为世所公认。而古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长期历史，也为世所罕见。特别是日本民族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可贵精神，更值得敬仰。在今天对于我们也具有现实的意义。环绕遣唐使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盛举，日本史学界著述累累，网罗无遗，条分缕析，备极详尽，足见其重视的深度和广度。反观我国，史籍中一鳞半爪，语焉不详，而专著尤为少见。当前中日友好正进入新阶段，介绍历史上遣唐使的来龙去脉及其生动事迹，对于加深相互了解，促进两国友谊，当亦有所裨益。惟因资料欠缺和本人水平有限，谬误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一九八三年四月

01/39/05

## 目 次

|                                   |         |
|-----------------------------------|---------|
| 一、遣唐使的先驱——遣隋使·····                | ( 1 )   |
| 二、遣唐使的历史背景·····                   | ( 10 )  |
| 三、遣唐使的次数、航路·····                  | ( 14 )  |
| 四、遣唐使的分期及各次概况·····                | ( 23 )  |
| 五、遣唐使的组织、人选与待遇·····               | ( 39 )  |
| 六、以生命为赌注的渡海关·····                 | ( 47 )  |
| 七、末期遣唐使的巨大牺牲与忌避入唐风潮<br>的出现·····   | ( 55 )  |
| 八、唐之优遇与唐日间的矛盾·····                | ( 63 )  |
| 九、遣唐使的丰功伟绩·····                   | ( 69 )  |
| 十、遣唐留学生、留学僧及其对日本文化和<br>宗教的贡献····· | ( 85 )  |
| 十一、遣唐使时期入日籍汉人所作的特殊贡<br>献·····     | ( 103 ) |
| 十二、关于遣唐使废止原因的探讨·····              | ( 112 ) |

## 一、遣唐使的先驱——遣隋使

按中日交往，始自远古，信使往还，屡见史籍。例如《后汉书·东夷传》上即有“光武中元二年（公元五七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的记载。其后《魏志·倭人传》上载日本女王卑弥呼先后于公元二三九年及二四三年两次遣使朝贡。又据《晋书》等记载，公元二六六年日本女王菟与曾派遣由二十人组成的使团来朝。特别是南朝的《宋书》上载，自公元四一三年至五〇二年，日本的讚、珍、济、兴、武等五王（即《日本书纪》所载的仁德、反正、允恭、安康、雄略等天皇）先后十三次遣使朝贡。这些使节来朝，只是一般的修好，并不具有政治的或文化交流的意义。但自公元六〇〇年迄六一四年间日本派出的遣隋使则具有政治目的和文化使命，而随派留学生和留学僧的第三次遣隋使，是为日本直接向中国全面汲取文明的嚆矢，亦是以后规模巨大的遣唐使的前奏，从而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公元五八九年，杨坚继夺后周之后灭陈而统一南北，建立大隋帝国，是即隋文帝。他锐意求治，故国力充实，远近归心。当时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文帝即位后九年（开皇九年，公元五九八年）因高丽进攻辽西，遂举兵征讨；而百济、新罗

则乘机向隋朝贡，借隋国威，抗衡高丽。此时，日本在朝鲜半岛上苦心经营了三百多年的侵略基地任那已于公元五六二年为新罗攻占，大和朝廷随时相机伺隙，久怀重占之心。公元五九三年，日本女帝推古天皇在即位之初，即以其侄厩户皇子为皇太子，且令摄政，是即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圣德太子。在文帝征伐高丽后二年（公元六〇〇年，日本推古八年）起，圣德太子便先后两次兴兵，攻打新罗，但终不得手。由于侵略朝鲜半岛的失败和豪族间倾轧争夺的激化，又鉴于隋之强大及其振兴佛教的成功，圣德太子等日本当政领袖暂断经略朝鲜半岛之念，在内政中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以便安定内部，改造国家；在外交中执行与隋修好、牵制新罗的方针，同时，藉遣使入隋的机会，从中国本土直接汲取优秀文化，并输入佛教。此即遣隋使的历史背景。

第一次遣隋使是在日本圣德太子第一次征讨新罗中派出的，时当推古天皇八年（公元六〇〇年）。据《隋书·东夷传》云：“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北史·倭国传》也有同样记载。日本史书《日本书纪》则竟告阙如。当时隋王朝完成统一大业，颇具国威，这一年突厥、高丽、契丹等东方诸国多入隋朝贡（《隋书·高祖记》），据此情形来看，日本遣使来朝，当属可信。

第二次遣隋使，出发于日本推古十五年（隋大业三年，公元六〇七年）七月，翌年四月回日本。《隋

书·东夷传》上载称：“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日本书纪·推古天皇纪》上也载称：“十五年秋七月戊申之朔庚戌，遣大使小野妹子于大隋，以鞍作福利为通事。”

此时，因隋炀帝在即位后力图扬威远藩，派遣使臣去招抚诸国，一时来隋朝贡者达三十余国。小野妹子等适于此时抵隋都洛阳。对于隋都的繁华情况，他们不禁“瞠目惊视”。隋都的“街上树木，全都裹以丝绸”，“夜深而街衢依然热闹。大剧场和有印度象的杂技团等处人山人海。外国使者所到之处，饮食免费。据称隋是世界第一的物资丰富国家，故不收费”。而此时的日本“尚无货币”。（中村新太郎《日本同中国的二千年》）可见隋炀帝对各国来使十分优渥，且极尽铺张、虚饰、矜夸之能事。

不料，这一次遣隋使呈递的国书却掀起了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轩然大波。小野妹子呈递的国书是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耶”为其首句。隋炀帝览此不悦，以为一个东夷小国，竟敢与隋分庭抗礼，而且措词不逊，用字僭越，乃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并置之不理。后经日使再三解释，以日本人粗学汉字，不善文章为辞，不但得到谅解，且“犹怪其意气高远，遣裴世清等十三人”为答礼使回访日本（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以示泱泱大国隋之恢宏器度。在今天看来，隋炀帝这一容忍大度的措置，对以后中日友好关系的长期发

展起着有益的作用。附带说明，这一事件还成为日本正式改定国号的起因。据森克己在其所著《遣唐使》中称，日本对内向以大和朝廷之名来代表国家，但国际上却一直称之为倭国。在后面将要提及的公元六四五年所谓“大化改新”之时，日本仿效唐制，改为中央集权国家，遂拟废止原来氏族制时代的国号以改变国际上不雅的称呼，旨在一新面目。于是从上述第二次遣隋使携带的致隋的国书中“日出处天子”句得到启示，遂改国号为日本。我国《新唐书·日本传》内亦有“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之句，可资佐证。

公元六〇八年四月，当隋的答礼使裴世清等十三人到达筑紫（即北九州）时，日都飞鸟宫廷为之震动。圣德太子遣难波吉士雄成赴筑紫迎接，又命在难波（即大阪）高丽馆之上方建造迎宾馆。六月十五日隋使一行抵难波，即日由飭船（按飭意为银饰，飭船当系以银装饰之船——作者）三十艘迎入宾馆。小野妹子则先行晋京，上奏云，隋炀帝回致日皇的国书，途经百济时被掠取，无以呈递。日皇廷乃下群臣议罪，曾判以流刑。但天皇以此事不宜为隋使所闻，特下敕赦免。经此周折，裴世清等滞留难波五十天之后，始于八月三日进入日都。对于此事，《隋书·东夷传》上也有记载：“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仪，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等。其实，隋的国书并没有遗失，乃因国书称日皇为“倭王”，日使不敢上奏所致。日本《经

籍后传记》载称，“其书曰，皇帝问倭王。圣德太子甚恶其黜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等语，可为佐证。《日本书纪》记载裴世清所携隋的国书原文为：“皇帝问倭皇（原文为倭王，被《日本书纪》窜改），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即小野妹子的当时汉译音）等至具怀。朕钦承宝命，临御区宇，思弘德化，覃被含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皇（应为王）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深气至诚，远脩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别。”

尽管日本朝廷内部有上述周折，但接待隋使裴世清的仪式却十分隆重。八月三日先遣飭骑七十五骑迎之于海石榴市衢。对此事《隋书·东夷传》上亦载称：“倭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八月十二日裴世清等入朝觐见时，自圣德皇太子以下诸王、诸臣悉头著金髻华，所著衣服均用锦紫绣织及五色之绫罗，礼仪之盛，可以想见。

同年九月十一日，当裴世清等自难波启程回国之际，日皇廷又遣小野妹子为大使、吉士雄成为小使（意即副使）、鞍作福利为通事，同行赴隋，是即第三次遣隋使。日皇廷并令留学生四人、学问僧四人从之。《隋书·东夷传》上也载有“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之句。日使小野妹子翌年（公元六〇九年）九月回日，但鞍作福利未归。此次日皇致隋的国书，据《日本书纪》所载，虽无不逊之辞，但仍具有不屈服于当

时隋之大国沙文主义的分庭抗礼的气息。原文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季秋薄冷，尊候何如。想清念（“念”同“豫”，安宁之意），比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

第三次遣隋使的派遣，既是出于外交礼节上的考虑，更重要的目的则在于派遣学生、学问僧赴隋留学，汲取先进文明，特别是引进佛教。圣德太子听说隋文帝即位后一反北周武帝之废佛毁释，大力复兴佛教，国内大治，便也图仿效，藉以收拾当时大和朝廷内皇族和中央贵族之间不断的内讧、倾轧，特别是苏我氏势力凌驾于皇室之上的局面。他除于推古天皇十二年（公元六〇三年）制定冠位十二阶制度，从立法上把豪族官僚化，并于翌年发布十七条宪法，推行统一权力于天皇的中央集权政治，更进而企图把崇奉多种多样神祇的豪族吸引到信奉佛教上来，从宗教上统一信仰，缓和豪族间的对立抗争。（森克己《遣唐使》）故《隋书·东夷传》上记述此次遣隋使来朝，有“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有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之语，可见学佛即是这次遣隋使的使命之一。又在迎接隋使裴世清时，日皇致辞中有“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之语，可见学习中国文明是这次遣隋使的另一使命。派遣的留学生有倭汉直福因（留学十六年）、奈罗译语惠明（未

详)、高向汉人玄理(三十三年)、新汉人大国等四人。留学僧有新汉人旻(二十五年)、南渊汉人请安(三十二年)、志贺汉人惠隐(三十一年)、新汉人广齐(十六年)等四人。他们自隋而唐继续留学,故时间特长。这里所谓汉人或新汉人,或系指定居日本的汉人后裔,或系指那些“熟悉汉字、稍通华语”的日本汉学家。(《日华文化交流史》)又据森克己《遣唐使》内称,汉人、新汉人乃归化的中国人和归化未久的中国人所受赐之姓。遣隋使时代,日本文化水平低,教育更不发达,知识分子阶层以汉人后裔占多数。他们通中国语言,获选赴隋,自属当然。这也是与后来遣唐使时代的留学生、僧不同的一个特点。事实上随遣隋使来华的留学生、僧不止八人,因为《隋书》上明白载有“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之语,而《日本书纪》亦有“推古天皇三十一年(公元六二三年)回国的僧惠光、医惠日,舒明天皇四年(公元六三二年)回国的僧灵云、胜鸟养,同十一年(公元六三九年)回国的僧惠云”的记载。他们都是遣隋使时代的留学生、留学僧。这一批留学生、僧后来对于移植中国文化以及改革日本政治都作过很大贡献。特别是高向玄理、僧旻和南渊请安等三人对于公元六四五年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新”,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

第四次遣隋使于推古二十二年(公元六一四年)六月出发,以犬上御田耜、矢田部造为正副使。犬

上御田耜等翌年回国报命。这次遣隋使只见于《日本书纪》，但语焉不详，而《隋书》则付诸阙如。

遣隋使的通路，相当于后来遣唐使初期的北路，即从筑紫(北九州)经壹岐、对马，渡抵朝鲜，沿朝鲜西海岸北上，横渡黄海至山东半岛登陆，然后从陆路上洛阳。参照《隋书》所载，亦云“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于倭国，度百济(朝鲜南部)，行至竹岛(位于全罗南道珍岛西南的小岛)，南望耽罗国(即济州岛)，经都斯麻(即对马)，迥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即壹岐)，又至竹斯国(即筑紫)”，可见往复路线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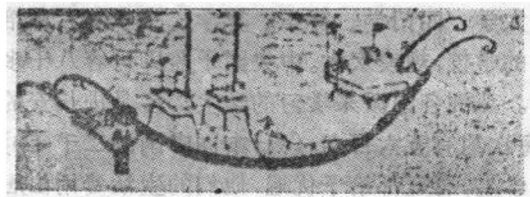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并非自遣隋使始。中国秦汉时代早已高度发达的古文化，早已以朝鲜半岛为桥梁，经过各种途径传播到当时还处在刻木结绳、没有文字、以渔猎为主、初知稻作的落后的日本。(《日本同中国的二千年》)但当时中国文明的对日传播，是从“三三五五移住日本的韩人或乐浪、带方(现朝鲜地区)的汉人传来，亦即听任自然、极其缓慢地经朝鲜半岛而输入日本”，“在日本上古，从物、心两方面丰富国民生活的，即是中国的文化”。(《日华文化交流史》)可见中日文化交流，在其初期阶段，完全是循着自然演变，并没有有意识的人为努力。随着中国先进文明的逐渐渗透和对日本民族从物质到精神生活两方面影响的日益加深，当时略通中国典籍、粗知中国文化的日本先觉者们，例如当政的圣

德太子等,于是产生“无宁深入到堪称东方文化渊源的  
中国本土,直接汲取优秀文化的念头”。(《日华文  
化交流史》)因此,遣隋使的历史意义在于标志着日  
本民族不满足于自然传播,而采取派遣使团、留学生  
与留学僧直接汲取中国先进文明、改造国家的积极  
行动的肇始。他们是后来长期、连续派遣的遣唐使  
的当之无愧的先驱。

## 二、遣唐使的历史背景

迨唐继隋而兴，国力隆盛。此时，日皇廷仍念念不忘讨伐新罗，重占任那，曾一度采纳公元六二三年（推古三十一年）由唐归国的留学生与留学僧惠齐、惠光、医惠日、福因的进言，与唐修好，并于六三〇年（舒明天皇二年）派出以犬上三田耜、药师惠日为首的第一次遣唐使。“大化改新”后，还分别于六五三年、六五四年（白雉四、五年）连续派出第二、三次遣唐使。与此同时，日本与新罗间的纷争渐趋激烈。大化二年（公元六四六年）九月，日本遣高向汉人玄理至新罗，责令停止由新罗、百济取代任那对日皇廷作的有名无实的进贡，并要求新罗提供人质。新罗乃于公元六四八年（唐贞观二十二年，大化四年）派伊飡金春秋使唐求援，并获准于翌年正月起新罗服饰改从唐制。（朝鲜《三国史记》）两年之后，即公元六五一年（白雉二年），新罗派使着唐服赴日本，显然旨在暗示有唐援可恃。日皇廷震怒，不许入见，并将使者驱逐出境。于是日本乃转而与百济携手对抗新罗。百济本亦早与高丽结托，阻塞新罗向唐进贡之路，唐太宗曾因此而两度远征高丽。唐高宗继位，改变战略，派苏定方、刘仁轨二将率兵十余万在新罗协助下攻陷百济，置五都，各设都督，驻屯军队。

百济遣鬼室福信等据守任存、射岐、南岑、真岨等山城，并向日本求援。日本遂出兵二万七千。公元六六三年(天智天皇二年)八月，日军与唐、新罗联军进行有名的白村江(锦江口)之战，以惨败告终。自是之后，日本慑于唐、新罗联盟的威力，不得不彻底断绝重占任那据点、染指朝鲜半岛的野心，并又深惧强大的唐陆海军的来袭，惶惶不可终日。而唐灭百济之后出于进一步讨伐高丽的战略考虑，对日本采取怀柔政策，先后两次由百济镇将刘仁轨、刘仁愿分别派遣郭务棕、司马法聪等使日安抚。日本亦派使回访，极尽卑词厚币之能事，紧张气氛有所缓和。白村江一战，是促使日本转而采取亲唐外交的转折点。于是，趁唐大军灭亡高丽，在平壤、扶余两地分置都督府之际，日皇延于公元六六九年(日本天智八年)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赴唐朝贺，《新唐书·日本传》亦载称“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这次遣使的政治目标十分明显，显然是为了通过外交途径来缓和紧张局势，藉以回避危机。日本政策的转



遣唐使舶

变带来了中日两国关系的重大改观，为以后次数更多、规模更大的遣唐使的派遣铺平了道路。这便是遣唐使的国际背景。

同时，遣唐使还有更重要的背景。通过四次遣隋使，日本在初步直接接触中国的优秀文化并有所汲取之后，“对中国优秀文化益加叹羨和憧憬，朝野上下醉心于学习和模仿，形成一股狂热的学习高潮”。（《日华文化交流史》）前述公元六二三年由唐归日的医惠日等力说唐朝制度文物的隆盛发达，必须与唐长期通好的进言，亦对作出遣使赴唐的决定起了促进作用。而当时的中国，在唐继隋统一全国，历太宗、高宗等诸代的治世后，经济高度繁荣发达，文化空前隆盛辉煌。唐都长安，人口号称百余万，与西亚的巴格达并列为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是亚洲诸国盟主之都。前来朝贡的使节，络绎不绝，故唐诗中有“万国衣冠拜冕旒”之句。长安又是国际都市，设有各国商馆以接待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据文献记载，到中唐时居住长安的外国人达四千多人，其中大多为中亚细亚各国的商人。长安又设有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书学等六种培养人才的学校，规模宏大。中央国子监即可容八千多个学生。亚洲各国派来学习的学生，多是进长安的太学，每次约有五六百名。（《日本同中国的二千年》）对于留学生，唐廷都给予优遇，他们的生活费用由唐补助，四季发给被服，这使不少留学生的留学期长达